

忠良文史资料

(总71—75期)

文史资料

第六期
(总 71 期)

重庆市忠县教育委员会
忠县史志协会 县政协文史工委

合编

2000年12月10日

★

纪念吴毅烈士与广州起义专辑

编者按：在伟大的广州起义73周年之际，我们编印了本期专辑，以纪念广州起义及其领导人之一吴毅烈士，宣传和弘扬先辈的精神。

本期要目

- 书刊文摘** 纪念吴毅烈士..... 陆定一(1)
陆定一同志向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 (2)
广州起义..... 聂荣臻(9)
吴毅传..... (14)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终身..... 区梦觉(18)
往事回忆..... 黄 平(19)
珠江在咆哮..... 何 潮(25)
- 档案资料** 关于调查吴毅烈士的一组信函..... (40)
- 研究文章** 吴毅是广州起义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袁代奎(43)
- 纪念活动** 石宝镇隆重举行吴毅小学授牌仪式..... (53)
忠县教委关于石宝镇山羊村小更名的通知..... (54)
广州市政协和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贺信..... (56)
弘扬先烈精神，争创巴渝名校..... 胡勤连 黄 勇(57)

纪念吴毅烈士

陆 定 一

我认识吴毅烈士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香港。当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中共广东省委召集会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我和吴毅同志都参加了。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忠诚而极有才能的党的干部，起义的失败没有使他悲观失望，而是激发了他更强烈的革命热情。这是最好的共产党人的品质。以后，他象周文雍同志一样，受省委的派遣，不畏艰险，回广州工作，牺牲在广州，以鲜血和生命表示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是我们的模范，是忠县人民的光荣。

* * * * *

忠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1984年11月2日来信收到。知道吴毅烈士的籍贯，谢谢。

我与吴毅同志素不相识，只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相见，一同参加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又分别了，再未相见，只知道他被省委派回广州工作，英勇牺牲。他很能干，上海话、广州话都说得很好，我还以为他是江浙人呢。其余的事，我都不知道，所以，很难为他写些回忆的文字。

写了几个毛笔字，纪念吴毅同志。

以外，愧无以报，请原谅。

专致敬礼！

陆 定 一

1985年1月3日 北京

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 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摘)

必须竭力注意发动群众，把广州暴动立刻造成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来完成并保障广州的胜利。

那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复活起来了，伟大的示威运动，以及零碎的经济斗争，是在不断的暴发。但是新军阀方面的压迫也日益加紧，最后竟解散“省港罢工工人委员会”，这是给广东的党以严重的打击。三千熟练的工人纠察队，以及万余久经战斗的工人也因此大半不能参加这一次的暴动。广州的党和团，工作限于罢工工人及已有力量的工会，有几个工会就做几个工会的工作，不谋扩大，不想把工作深入其它工会以及反动工会中去。这些群众，在这次暴动之中，一部分帮着军阀（如广州暴动中机器工会千人，参加反动军队，助军阀反攻），但大部分是表现得很好的。

时机到了，粤桂之争起，第二方面军大部调往西江，广州仅留很少的反动军队；李福林部是在河南，人数甚少，而且素来不能战斗。广州市内仅有第三师一个团。薛岳一团（皆新兵）、炮兵团、教导团等。教导团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共十一连半，只消在团内解决少数反动分子，就可以完全做我们的武力。我们自己的枪支只有二十多杆，炸弹一百五十。省港罢工工人武装较多，但在暴动前被破获机关，失枪支万余，只剩几十了。

军事上现在的确到了个动的时机了，同时已经有消息说反动军队要解决教导团。我们以前已经损失了省港罢工工人及纠察队，若是教

导团让他解决，那末，将没有发动暴动的能力了。为了争取时间，以及不再损失力量，所以省委就赶快的决定十二日暴动。

现在既然认定发动这暴动必须以军事为主力了，所以必须预先提防反动军知道，以致完全失败（因为反动军队究竟比我们多）。所以青年团想在暴动之前（十日）散传单及演讲，也被停止。

当时中共方面，准备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织革命委员会。太雷专管军事与政治，黄平、周文雍管理工人方面的指挥（因为周文雍是赤卫队总指挥），另以吴毅（市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为秘书，并理党务。因而革命委员会中无工人分子参加，暴动自始至终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市委并决定了苏维埃名单，列十五人，皆广州工农兵的领袖。技术上的准备则非常欠缺。苏维埃、红军总指挥部、侦探、交通、宣传队等都是仓卒组成。赤卫队的编制、枪械的发给，政府的布告（以及印刷），粮食之征集与分配，捕杀反革命及没收其财产之组织，各工会的负责人工作，都未计划到。甚至苏维埃的大印，到暴动第二天下午才刻好。技术准备的欠缺，对于工作发生严重的影响。

军事的计划，发动时以教导团十一连半分配缴各地敌军之械（第三师之新兵一团、炮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观音山、第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则攻警署并守卫。西关有薛岳的新兵一团，因无兵可派，不能解决（后来此军即于第二日反攻观音山）。河南李福林的军队，则更无我军去解决。全市占领后，立即将枪械分与工人及俘虏，补充队伍，以攻河南。

计划既定，到十日消息传来，西江的反动军队已在调回，反动派已知广州空虚之非计。于是我方不得不更提早暴动日期，于十一日晨三时举行武装暴动。十日夜晚，广州登时戒严，且闻解决教导团的谣言。但至十二时后仍无动静，十二时后街上已经解严。我们的汽车通

行，无人干涉。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于十日夜十一时才由香港到省。枪声忽起，大暴动起来了！反动派正在瞌睡中。

随着第一枪，颈围红带的工人兵士，已经满街发现，唾手而广州市完全占领，只有长堤的战争还在继续。兵士则向西关方面进攻，公安局起先以为是很难到手的，不料一冲而入，毫无抵抗，立刻成为我们的大本营，警察等纷纷弃枪而逃。工人群众平日想枪如想爱人一样，纷纷争取，没有秩序，也无队伍，也无指挥，只向有枪声处跑，加入前线作战。后来把夺到的枪运到公安局散发，工人群众就拥在公安局门口抢枪，汽车一到即空。机器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之下的工人也有许多前来参加。据统计，参加这次暴动的工会，有四十三个，人数上万，有编定的赤卫队有两千人。……

十一日下午我们已占领西关了！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他勇往向前的精神，牺牲是很大的。

那时的环境，一方面是河南的敌人尚未肃清，各处敌人的反攻虽然还未到眼前，但是期在不远。各路反动军队都已兼程前来，军事形势更加紧张了！

那时的工作，是集中在编制赤卫队，想以工农俘兵，与教导团组成一师至二师，但是因为指挥的混乱，以及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新的广大群众继起参加暴动，计划迄未实现。

是夜，太雷、黄平与洋人等开了一会，洋人批评军事上之不敏捷，应当乘胜以全力援西关河南。叶挺因为到省很迟（暴动前三小时），所以有许多事情不清楚。徐光英（参谋长）更是表现得非常糊涂。于是以太雷为红军总指挥。太雷对于军事是外行，但对于我们军队的情形，是比任何人懂得，可惜少一好参谋！

农民中工作之不好，以致到现在不能起来响应，使军事上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广州暴动虽然这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但四郊农民，仅占两个东（车）站，杀了一个地主。对于发动农民事前未注意到，暴动起来之后，也未努力设法去做。固然客观上有许多困难。

十二日上午依然是进攻的形势。到下午四方八面的警报渐渐紧急起来了。民团、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反攻，冲锋到厚祥街（近赤卫队总部）。周文雍即离总部，而工人一点也不退却，拚命与反动军队作战，竟把他击败，重新占领观音山。但是观音山的一带路上，时有敌人的枪子，时太雷及洋人由群众大会乘汽车回来，在四牌楼遇到敌人，太雷及车夫死在车中，洋人不知怎样脱险回来。广州的汽车夫，虽然生活是优越些，但是这次参加暴动非常热烈，有许多因开汽车而被打死。

太雷既死，军事失去了中枢，无人可以接他的手，徐光英非常畏缩，那能在艰难困苦中处理这样混战的局面？

当敌人冲到厚祥街时，公安局仅留恽代英同志一人在指挥。太雷死了，以及敌人被我们打退的消息，他都没有知道。忽而黄平、吴毅回来叫恽代英快走，他们两人就预备在此地拚了。原来他们两人之匆匆回来，还是听到赤卫队总部被占的消息。赤卫队总部与公安局相隔不远，总部既然被占，公安局当然非常危险了。所以他们想把恽代英保留下来，而自己就在此地拚个一死。但是实际上那时敌人已被我们重新打退赶到观音山去了。

到晚上洋人始到公安局，黄平与洋人开会时，证实了太雷的死耗。同时四方八面消息更加紧张，并且有敌人十五分钟即到公安局的消息，那时退路也想不到。洋人就说现在情形既然如此，党及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退，留军事同志在此指挥，看形势再说。因此黄平、吴毅

等即退回秘密地址中去了。这是广州暴动中最后一次会议！

赤卫队及兵士仍不知敌人已到眼前，依旧在前敌打仗及在街上守卫，颈上围了红带，胜利而且得意。支持了一夜。吴毅始从秘密住所中跑出来。及至十一时，市内已发现了敌人，下午三时敌人占了公安局。

敌人兵队的怕我们，也是非常利害。经过几次战斗，已认识了工农的勇敢了。观音山上的敌兵，看见公安局的大红旗，不敢冲下来，用炮将红旗轰倒了才敢下来。马房里的马他们不敢公开的来抢，而悄悄的来偷。十一时进了广州市，三时才敢跑进空无一人（除了二百反革命以外）的公安局！

敌人入市之后，对于毫无防备的工农兵士，就大施屠杀了！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死尸，几乎是见红即杀！广州市登时血流成河！除千余工农兵士向北退走之外，同志牺牲者二百余人，赤卫队及兵士牺牲者两千余，民众更不知死了多少！

从十三日起，搜捕屠杀更是加紧的进行，国民党军阀，以种种酷辣的手段，施之工农。总计屠杀之数在五千以上！每天枪毙惨杀的总有千人以至四至五百之多！国民党撕下了人皮，变成一支狗，现在狗皮都撕下，露出它吃人魔鬼的本样了！搜捕之中负责同志未有损失，洋人亦安全的。

省委扩大会开了两天，有党中央代表报告（他更注重组织），团中央代表报告，团务报告，党省委代表报告。决议案中有1、听了共产党（C.P.）中央报告与省委报告决议案。2、听了青年团（C.Y.）中央报告决议案。3、目前任务决议案。4、告全国同志书。5、士兵工作大纲。因为没有预备，所以决议案都是当场起草（除士兵工作外）。时间很不经济。报告及决议案的次序亦颠颠倒倒，对于目前工

作等，讨论时无人发言，看出大家心中无底。

十二月廿九日

后 记

给团中央的这个报告，原来的题目是《D. Y. 同志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C. Y. 在暴动中的工作》。这个报告是一九二七年底我在香港写的，距今五十六年。

广州暴动的消息，十二月十一日就传到上海。

同日，团中央派我急速起程，去参加广暴。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我是坐一艘货船去香港的。船到香港，广暴已经失败。党和团的省委员会人员都到了香港。我同他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十二月中，因原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党中央派了李立三为省委书记，召集中共省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从各同志的叙述中，我才能写出这个报告，寄给团中央。这个报告，反映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发言和意见，没有加以夸张和隐瞒。

我自己当时的看法，不论对的错的，这里都不加改动，以存当时的真相。

但是，并不是说我对广州暴动知道一切了。我对于重要的事情还不知道。要感谢周恩来同志，他说出了最重要的事情。

请大家读读《周恩来选集》上册174页：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

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Newman，此人我后来在莫斯科看见多次，是台尔曼的很亲密的助手，常在台尔曼左右。后来希特勒上台，台尔曼同志被捕，最后被杀害，英勇牺牲。纽曼的下落，我就知道了。——陆注），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我还要说，周文雍、吴毅两同志，后来被党派回广州，恢复工作。他们都英勇牺牲了。派他们回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在广州熟人太多，极易被捕牺牲。

我在香港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奉团中央的指示，到海陆丰巡视。也写过一个关于海陆丰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党内团内流传较广。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就算现在这个报告，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因为署名是D. Y.，许多同志不知道这是我给团中央报告的笔名。对找出

这个报告的同志，谨表感谢。

当时许多同志的名字，凡能记得的都写上了，不记得的只能空着。

陆 定 一

1983年3月23日晨二时 北京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广 州 起 义（摘）

聂 荣 臻

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同志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象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对领导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等都是考虑不周的。

在起义前，我和黄锦辉除了参加有关的会议以外，主要是对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解决军火等。我到广州以后，就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老百姓一间房子，作为军委的联络点。杨剑英同志就留在那里，不参加别的工作，专门负责同各方面接头。

起义的日期，原定是十二月十三日，后来，被迫提前了。所以，一方面整个起义显得很仓促，另一方面也把诺伊曼的那套错误计划给打破了。被迫提前的原因，是我们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用手工制造的，然后分散运到城里大北街一家米店存起来。运输时用米袋把手榴弹混在大米里，偷运进城。过去黄花岗起义，也是用的这个方法，被敌人查觉。这次，由于我们

斗争经验不足，方式不密，也被敌人的岗哨发觉。随之，存放手榴弹的米店也暴露了。

米店的暴露，给了敌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同时，我们得悉，敌人通过别的渠道，也已经大体上知道我们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张发奎急急忙忙给黄琪翔下令，企图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另调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十二月十日，张发奎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械。形势万分紧迫，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发动。

起义被迫提前，一切都很仓促。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除了教导团组织比较严密，能迅速行动以外，预定要参加起义的人，临起义时有的还没有通知到，有的接到通知的手车夫工人甚至说，我的车还没有拉完呢。有的互相问，开会了没有，究竟怎么办？领导指挥方面，也很仓促。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十二月十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开始了。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教导团，他们先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然后与工人赤卫队联合起来，兵分几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展开进攻。

到十一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敌人据点，如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等地，以及炮兵团、敌人各后方机关、几个师部等军事要点，都被我们占领，各处的敌人，大部交了枪。我们没有攻占的地方只剩下四处：长堤的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的公馆和检察院。这些地方，由于敌人顽抗，又处于不利地形，所

以没有攻下。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的第五军所盘据，隔江和我们对峙。

占领公安局以后，我便进入公安局，按预定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当时作为省军委的负责人之一，起义的两天中，就一直在总指挥部工作。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也经常指挥部。我的办公地方，就是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

到了十二日，情况就严重恶化了。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朱晖日等在河南第五军军部策划好了镇压起义的行动。十二日一早，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各路起义军虽然自发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于因为力量过于悬殊，又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我们逐步退却，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

接着就是张太雷同志的牺牲。十二日上午，不顾枪炮声到处在响，起义的领导机关就十分仓促地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自然有顾虑，直到中午时分，到会的人数仍不是很多。张太雷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开会回来的路上，由于不注意警戒，中了埋伏，被敌人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领导机构以至整个起义都失去了核心。

起义失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象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据后来看到的书报记载，十二月十三日以后的五六天时间，敌人枉杀广州人民多达五千七百多人。看，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是多么残忍啊！

我在住地呆了三天之后，才回到香港。杨剑英同志在我之后也回到了香港。……到香港不久，找到了省委机关，找到了黄锦辉。刚到的几天，我们收容了一批从广州转来香港的同志，作了妥善安置。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多久，李立三同志就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来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相当多，我记得的有张善铭、恽代英、周文雍、陈郁、黄平、吴毅、杨殷、邓发等同志。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他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还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确对待这次牺牲了几千名同志的群众起义。但李立三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他采用了惩办主义，决定处分大批同志。与会同志坚决反对他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我也感到非常愤慨。

会后，李立三同志自己担任了省委书记，并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央。中央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间派周恩来同志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周恩来同志到后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周恩来同志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从根本上说，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但广州起义仍然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继南昌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又一次英勇的反击，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

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和锻炼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起点。正是从这三大起义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通过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道路。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我和叶剑英等同志多次议论过，广州起义究竟应不应该搞？我们一致认为，当时教导团已经暴露，张发奎正调兵遣将，准备对教导团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也是不对的。因此，如果在广州我们搞一个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纪念死难诸先烈（摘）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1928年11月）

在本省范围内，因为阶级斗争的激烈，在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压迫之下，亦牺牲了不少的英勇的同志与革命的工农领袖。扩大会议特别指出李源同志（前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吴毅同志（前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在革命斗争中的牺牲，全党应当永远纪念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精神永远鼓励我们，……

（摘自《广东党史研究资料》第一辑）

吴毅（1907—1928）

广州起义失败后，吴毅重新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陆定一在回忆吴毅时说：“起义的失败没有使他悲观失望，而是激发了他更强烈的革命热情。这是最好的共产党人的品质。他是我们的模范。”

吴毅，原名心仁，字季良，1907年生于忠县石宝寨吴家湾一个书香之家。小学毕业后，同三哥吴心俊一起，于1922年考入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七期学习。次年春，共产党人萧楚女来到该校，任第七期的级任老师和语文教师。他积极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革命主张，提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省四师的反动势力猖獗，既有复古守旧派，又有国家主义派，他们同革命势力作对。萧楚女毫不留情地同他们作斗争。吴毅追求进步，坚决拥护和支持肖楚女，在校内外办墙报，义正辞严地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和封建守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真理，促进了省四师师生的觉醒，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3年夏，萧楚女介绍吴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萧楚女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仇恨和恐惧，军阀唐式遵强迫萧楚女离开省四师，并通令开除吴毅等进步学生。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迫害，更坚定了吴毅的革命决心。他得知广州已成为革命的策源地，1924年秋天，他联络几个热血青年，负笈离乡，长途跋涉，到了广州，考入了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经常得到萧楚女、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教诲。1925年夏，吴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秘书。他跟随区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参加工会和支部的会议，指导群众的斗争，很快熟悉了各方面的情况。他文思敏捷，广东区委的一些重要文件，多出于他的手笔。

1927年春，革命风涛汹涌澎湃，北伐战争捷报频传。但胜利中潜伏着危机。3月下旬，陈延年、邓中夏等离开广州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吴毅和区委秘书长赖玉润、组织部部长穆青等担负起区委的领导工作。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3日深夜，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吴毅同穆青、赖玉润等出席，会议决定用广东区党、团和工农等群众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表反抗蒋介石制造四一二血案的宣言，同时决定各部负责人暂停公开办公，以防不测。

4月15日，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中共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邓培、萧楚女、熊雄等许多党的重要干部壮烈牺牲，2000多名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捕杀。

面对反革命的屠杀，共产党人开展了英勇的反击。4月17日，吴毅和周文雍、穆青、赖玉润、杨殷等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将广东区委迁到香港办公，组织广州市委，恢复和巩固各级党的组织，掌握各级工会的领导权，团结工人群众同敌人作斗争。20日，广州的海员、运输工人举行政治罢工。21日，全市工人罢工一小时，散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组织工会等团体请愿，要求释放被捕革命群众。4月下旬，中共广州市委成立，吴毅被选为书记，周文雍为组织部部长。五一国际劳动节，市委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请愿和革命宣传活动。在省港罢工纪念和沙基惨案纪念时，接连两次进行大示威，高呼“反对白色恐怖”、“要求释放政治犯”、“肃清反革命”等战斗口号，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8月，广东区委改为广东省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吴毅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并继续担任广州市委书记。

11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抓住粤桂战